

聖經文本問題探討

兼論對聖經中譯的省思與展望

崔寶臣¹

本文從聖經原文及文本的豐富多元談起，作者一方面從歷史的角度梳理直至今日聖經原文及文本的研究狀況，並介紹各種聖經文本所做修訂的各種版本；另一方面亦期能為聖經中譯帶來某些省思與展望。

在進入正文之前，首先要感謝房志榮神父，因著他在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及華人世界在聖經研究方面的貢獻，才有了今年以「聖經在華，沃土新芽」為主題的神學研習會，也才有了這篇演講稿的誕生。查閱房志榮神父等身的著作，首先躍入眼簾的便是他在 1963 年以拉丁文撰寫的，研究《德訓篇》文本問題的博士論文²，而這也是房神父學術生涯中最早期的著作。可

¹ 本文作者：崔寶臣神父，聖經神學博士，畢業於瑞士弗立堡大學，專研舊約神學；現任教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授舊約相關課程。

² Marcus Fang Che-Yong, *Questiones theologicae selectae Libri Sirae ex comparatione textus graeci et hebraici ortae* (Roma: Pontificium Institutum Biblicum, 1963)。關於房志榮神父博士論文的更多內容，請參閱麥克儉神父的文章：〈房志榮對聖經中文翻譯的貢獻：動態對等/相等法〉，本期 207~233 頁。房神父於羅馬求學時間，還表發過圍繞《德訓篇》文本問題的其他幾篇學術文章：“Sir 7,36

見房志榮神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對聖經文本問題頗有興趣，只是因為來到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後，各種授課及行政事務繁忙，只得忍痛割愛。

本文嘗試要做的，並非聖經「文本考證」本身，而是點出聖經文本豐富多元的現象，並從歷史的角度，梳理直至今日聖經原文及文本的研究狀況，以求為聖經中譯帶來某些啟發。

一、導言：聖經原文及文本的豐富多元

包含不同書目的聖經。本文中提到的聖經，除非另有指明，是指天主教版的舊約聖經。因為現在的聖經學界，經常也會使用「希伯來聖經」一詞，指不包含用希臘文寫成或僅存希臘文譯本的「次正經」的經書。這是猶太人的聖經（他們沒有新、舊約，因為他們只有一本聖經，就是《希伯來聖經》），而通常來說，基督新教的舊約追隨的是「希伯來聖經」。至於東方教會（包括東正教、敘利亞教會、亞美尼亞教會、埃塞俄比亞教會等），因為從來沒有官方正式宣布的綱目，所以在聖經書目上多有不同，但通常來說，他們的舊約版本比天主教的舊約聖經還要多出幾本書³。

聖經原文。提到聖經中譯，我們首先想到的也許是中文，就是我們現在在講的語言。但我們不能忽略的另一個重要元

(Vulg. 7,40) iuxta hebraicam veritatem”, VD 40, 1962, pp. 18~26; “Ben Sira de novissimis hominis”, VD 41, 1963, pp. 21~38; “Usus nominis divini in Sirach”, VD 42, 1964, pp. 153~168.

³ 東方各教會的聖經中，一般都會有的版本包括：《默納協的祈禱》；《厄斯德拉》卷三、四；《瑪加伯》卷三、四；詠一五一。

素，就是聖經原文。因為在把聖經翻譯為中文之前，首先要知道，是從哪一種語言進行翻譯。而聖經原文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而且是一個頗為複雜的現象。因為在當時的巴勒斯坦，就像在今日的台灣，地域面積雖然不大，但卻不是一個單一的語言環境。今日聖經學界普遍認為舊約中的核心部分，用希伯來文寫成的「梅瑟五書」，作為整體，定稿並「出版」⁴於主前四世紀中葉⁵。而在這個時期，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日常所講的是阿拉美語。阿拉美語不僅是當時猶太人的口語，而且也慢慢成為他們書寫的語言。舉例來說，達一 1~二 4a 和八~十二是用希伯來文，而二 4b~七 28 則是使用阿拉美語（這其中不包括三 24~90⁶）。

一個世紀後，也就是主前三世紀，已經成書並出版的聖經經卷，開始在埃及北部的亞歷山大里亞被譯為希臘文（《七十賢

⁴ 此處所指「出版」與今日我們所認知的出版會有所不同，因為在古代，並不存在所謂的出版社或出版商。所以提到舊約文本的「出版」時，是指一份文件或一本書不再以私人的方式存在，而是同時散發給多位讀者。Cf. Adrian Schenker, "Histoire du texte de l'Ancien Testament", in Thomas Römer, Jean-Daniel Macchi et Christophe Nihan (éd.), *Introduction à l'Ancien Testament* (Genève: Labor et Fides, 2009), p. 42.

⁵ Cf. Olivier Artus, *Le Pentateuque, histoire et théologie*, Cahiers Évangile 156 (Paris: Éditions du Cerf, 2011), p. 14; Thomas Römer, "La canonisation du Pentateuque", *Communio* 265 (Septembre~Octobre 2019), pp. 23~37.

⁶ 因為達三 24~90（有關三聖童）是用希臘文，僅存於希臘七十賢士譯本中。

士譯本》的誕生)。語言的變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舊約聖經某些書卷的撰寫及正典化過程，我們在下文中會特別探討這一點。不僅有翻譯的現象，而且操希臘語的猶太人更是直接用希臘文撰寫，並且部分他們所寫的書也進入正典（《瑪加伯下》、《智慧篇》等）。

聖經文本。首先應該知道，沒有任何聖經的原稿得以存留下來，目前我們所擁有的僅是抄本，而且更好說是抄本的抄本。死海古卷的發現（始自 1947 年），讓我們得以目睹主前二世紀到主曆一世紀的聖經抄本的殘卷。而在這之前，我們所擁有的最古老及最爲完整的希伯來聖經抄本，是列寧格勒抄本（Leningrad Codex），約在 1008 年完成。另一個比列寧格勒抄本更早一些的是阿勒頗抄本（Aleppo Codex），寫成於主曆 910~930 年之間，但缺點是經文不完整，總共缺少約 30% 的舊約經文。這些重要抄本成爲後世希伯來文聖經印刷版本的藍本。

至於希臘文聖經，按照《德訓篇》希臘譯本序言，主前二世紀時，法律、先知和聖卷已經被譯爲希臘文。而「七十賢士譯本」一名則是來自一個傳說（歸於 Aristée 名下的一封信），講說當時的國王卜托肋米（Ptolémée，主前 285~247 年）希望在亞歷山大里亞的圖書館能夠擁有猶太人的經典，於是邀請耶路撒冷的大司祭厄肋阿匝耳幫忙，而這位大司祭派遣了七十二位猶太經師（每支派六個），讓他們在法羅斯（Pharos）島上分頭進行翻譯，他們共用了七十二天，而且譯出的經文幾乎一樣。其實這個傳

說的用意更好說是強調希臘文譯文也是受默感而完成的⁷。七十賢士譯本對基督徒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新約聖經多處引用此譯本。所以歷代的基督徒都很重視這個譯本的傳承。在現存的七十賢士譯本抄本中，最著名的應該是梵蒂岡抄本（Vaticanus，主曆四世紀）、西乃抄本（Sinaiticus，主曆四世紀）和亞歷山大里亞抄本（Alexandrinus，主曆五世紀）。

在下文中，我們先介紹希伯來文聖經的不同版本，這些版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它們為今日譯經提供可靠的藍本。接著我們會介紹七十賢士譯本與拉丁通行本的版本與傳承，因它們是今日譯經最重要的借鑒。然後我們會介紹聖經文本考證（textual criticism）⁸的來龍去脈，以了解這門學科在研究聖經尤其是翻譯聖經方面的重要性。最後我們看聖經中譯的現狀，並通過介紹兩本法文版權威聖經譯本，以期對今日聖經中譯提出我們的幾點建議。

二、希伯來文聖經

前面提到我們所擁有的希伯來文聖經的抄本，最早的是死海古卷，距今已經兩千多年，是今日出版和研究希伯來文聖經不能不參考的重要文獻；再有就是最為重要的列寧格勒抄本和阿勒頗抄本。然而第一本完整的印刷版希伯來文聖經，是於

⁷ 參：杰拉德庇翁、菲利浦格魯森合著，崔寶臣譯，《舊約聖經導讀，揭開古卷的秘密》（台北：光啓文化，2019），227頁。

⁸ 也可譯為：文本批判。當然這裡的「批判」不是表達指出錯誤，而是說在面對不同的文本時，如何找出最接近原始文本的努力。

1488 年在意大利松奇諾 (Soncino) 完成的。緊接著其他的版本也於 1492 年在拿波里 (Napoli)、1494 年在佈雷西亞 (Brescia)、1511 和 1517 年在佩薩羅 (Pesaro) 相繼問世。同一時代，也出現了第一本印刷的多語種聖經 (Polyglotte d'Alcalá)，我們後面會再提到它。

1516~1517 年，在意大利威尼斯 (Venezia)，一位皈依天主教並成為奧斯定會士的猶太人 Felix de Prato，出版了全套共四卷拉比聖經 (Bible rabbinique)，並且題獻給當時的教宗良十世 (Leo X, 1475~1521, 1513~1521 任教宗)。它的特色是，五書部分包含了希伯來文經文、翁克勞的塔爾古木⁹ 和中世紀著名猶太經師辣什 (Rashi, 全名 Rabbi Shlomo Itzhaki 的縮寫, 1040~1105) 的注釋，而其他書則包含希伯來文經文和託名約納堂的塔爾古木¹⁰。

⁹ 「塔爾古木」是一個阿拉美語單詞，表示「翻譯、解釋」。主前三世紀時，講阿拉美語或希臘語的猶太人，已不懂得用希伯來文寫成的聖經。所以人們開始翻譯這些經書。阿拉美語的翻譯首先是口頭上的，用在會堂的禮儀中，後來也有用來幫助個人或團體讀經的翻譯，裡面夾雜了解釋或任意發揮。主前二世紀開始，這些翻譯也被收集為文字。希伯來聖經的每本書都有相應的塔爾古木，其中五書的塔爾古木最多。最為著名的塔爾古木有翁克勞的塔爾古木 (Targoum d'Onqelos, 主曆二世紀) 和託名約納堂的塔爾古木 (Targoum du Pseudo-Jonathan, 主曆八世紀)。參：杰拉德底翁、菲利浦格魯森合著，崔寶臣譯，《舊約聖經導讀，揭開古卷的秘密》，250~251 頁。

¹⁰ Cf. Innoncent Himbaza, "La conscience des problèmes textuels de l'Ancien Testament. Etat de la question hier et aujourd'hui", in Adrian Schenker et Philippe Hugo (éd.), *L'enfance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Histoire du texte de l'Ancien Testament*, Le monde de la

第二版附帶注釋的拉比聖經是於 1524~1525 年，同樣在威尼斯，由一位正統的猶太人 Ben Hayyim 出版¹¹，據說是因為他不欣賞 Felix de Prato 所出版的聖經。而在 Ben Hayyim 出版的聖經中，五書部分除了包含希伯來文經文、塔爾古木和 Rashi 的注釋外，還在頁面的旁側和底側加上了小註 (massora parva) 和大註 (massora magna)。同樣也是在這個版本中，他標出了 Ketiv-Qeré，意思是說某個單詞的書寫 (Ketiv) 和發音 (Qeré) 並不一致 (類似中國古文中的通假字)。Ben Hayyim 認為 Ketiv-Qeré 的現象是巴比倫充軍後開始的。並且在導言中，他也指出某些註解 (massora) 之間前後不符合，以及古人對某些經文的解讀並不一致。在某些地方他甚至會說，「很明顯，事情並不像智者們所想像的那樣，願上主原諒他們！」¹²。通過這樣的導言，我們可以看到猶太人對聖經版本的文本問題一直都有很深的意識，並且嘗試給出他們的解釋。

同一時代同樣也在威尼斯，還有 Daniel Bomberg 出版的聖經 (1516~1517 第一版，1521 第二版，1525~1528 第三版)。尤其是 Bomberg 的第三版聖經，在新教改革時代被廣為使用，有學者認為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把聖經翻譯為德文時，便是使用

Bible N° 52 (Genève: Labor et Fides, 2005), pp. 46-47.

¹¹ Jacob Ben Hayyim Ibn Adonya, *Biblia Rabbinnica*, 4 vol (Venise, 1525)。此希伯來文版本聖經於 1972 年在耶路撒冷由 Makor Publishing LTD 出版社再版。

¹² Cf. Innoncent Himbaza, "La conscience des problèmes textuels de l'Ancien Testament. Etat de la question hier et aujourd'hui", p. 48.

這個版本和 1494 年 Brescia 的版本。¹³

直到廿世紀，Ben Hayyim 出版的聖經，雖然也經歷了一些修訂或被某些人排斥，但整體上在猶太人和基督徒的世界被廣為使用。

BH 系列。BHK (Biblia Hebraica de Rudolf Kittel, BHK 第一版完成於 1906 年，第二版 1913 年，第三版 1937 年，經常被標為：BH¹, BH², BH³)。中文版思高聖經舊約部分便是譯自 BHK 第三版。德國聖經協會 (Deutsch Bibelgesellschaft) 於 1977 年在斯圖加特 (Stuttgart) 出版了 BHS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偶爾也會被標為 BH⁴, 意為希伯來聖經第四版)。此版聖經直到 1997 共印刷五次，是目前為止世界上被使用最多的希伯來文聖經。¹⁴ 但是一個更大的計畫已於 2004 年啟動，原計畫 2020 年 (即今年) 完結，但顯然會要延遲完成，它同樣是由德國聖經協會負責出版的 BHQ (Biblia Hebraica Quinta, 或標為 BH⁵)。

BH 系列特色。由 Rudolf Kittel 負責的 BHK 的第一版(1906) 和第二版 (1913)，實際上是選擇了 Ben Hayyim 於 1525 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希伯來文經文。但 Paul Kahle 於 1937 年負責

¹³ Cf. Guy Bedouelle, "L'humanisme et la Bible", in G. Bedouelle, B. Roussel, *Le temps des Réformes et la Bible*, Bible de tous les temps 5 (Paris: Beauchesne, 1989), p. 70.

¹⁴ Cf. Adrian Shencker, Philippe Hugo (dir.), *L'enfance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Histoire du texte de l'Ancien Testament* (Genève: Labor et Fides, 2005), p. 14; 思高聖經學會，《聖經簡介》(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97 修訂版)，41 頁。

出版 BHK 第三版時則放棄了這一做法，而是選擇了更為古老的列寧格勒抄本（Leningrad Codex）作為藍本。這樣的選擇也被 BHS 和 BHQ 所繼承。列寧格勒抄本之所以被選擇，如上所述，因為是目前為止，我們所擁有的最古老及最完整的希伯來文聖經抄本。

列寧格勒抄本帶有由瑪索辣經師所發明的註解系統，分為小註（Massora parva）及大註（Massora magna）。小註放在經文頁面右側，而大註則放在經文頁面下方。當出版 BHS 時，所有的經文大註則單獨成冊出版，而在經文頁面下方只標明參照符號，而在經文頁面底部加上了經文現代批註。¹⁵

至於 BHQ，目前是每本書單獨成冊，各書由對該書有專業研究的舊約聖經學者負責準備。除了具備 BHS 的特色，每本書都有佔很大篇幅的導言，詳細列明並闡釋該書每個章節字句中可能有的經文問題。

BH 系列之外的希伯來文聖經。 HUBP（Hebrew University Bible Project），這是由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啟動的希伯來聖經出版計畫。雖然於 1956 年開始，但截至目前，僅僅出版了《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和《厄則克爾》三部先知書。這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出版計畫，目標是一部現代的評析性經文版本，而且會附有其他古代文本的佐證。與 BH 系列不同的是，HUBP 選擇的希

¹⁵ 關於 BHS 特色更詳細的資料，請參：Thomas Römer et Jean-Daniel Macchi, *Guide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La critique textuelle dans la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Genève: Labor et Fides, 1994）。

伯來聖經抄本藍本不是列寧格勒抄本 (Leningrad Codex)，而是阿勒頗抄本 (Aleppo Codex)。此一抄本的特色是比列寧格勒抄本更早，來自巴勒斯坦北部城市提庇黎雅 (Tiberias)，寫成於主曆 910 到 930 年之間，在經文和元音及重音標註上更具參考價值。但缺點是不完整，例如五書大部分闕如，另外其他很多經書也殘缺，總共缺少差不多 30% 的舊約經文。

HBCE (Hebrew Bible: A Critical Edition)，早期被稱為 OHB (Oxford Hebrew Bible)，是在英國倫敦啟動的希伯來聖經出版計畫。HBCE 的特色是沒有選擇某個希伯來聖經抄本為藍本，而是根據目前所已知的古代經文，甚至參考非希伯來語的譯文，經過每本書的負責學者細緻認真的文本考證後而重組的經文。每本書中都包括對經文詳細的文本注釋及導論。¹⁶ 目前已經出版的僅有由 Michael V. Fox 負責準備的《箴言》¹⁷，雖然《箴言》僅僅卅一章的篇幅，但是本書卻有 500 頁，足見注釋之豐富。

BHQ、HUBP 和 HBCE 都是非常嚴肅和龐大的希伯來聖經出版計畫。BHQ 和 HUBP，因為對希伯來文原文手抄本藍本的選擇及文本考證原則，學者稱之為標準版本 (diplomatic edition)¹⁸，而 HBCE，因為沒有選擇任何希伯來文原文手抄本為藍本，學

¹⁶ 詳細內容，請參 HBCE 的官方網站：<http://hbceonline.org>。

¹⁷ *Proverbs, An Eclectic Edi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Textual Commentary* (Atlanta: SBL Press, 2015)。

¹⁸ 或稱之為「參照版本」。這裡的標準版本不是指官方的版本，而是指面對不同的抄本時，選擇認為最可靠的一個抄本作為藍本。Diplomatic 在這裡是指對古代文獻的研究。

者稱之為折衷版本 (eclectic edition)¹⁹。

三、希臘文聖經

上面提到的是希伯來文聖經的出版，因為七十賢士譯本對研究舊約聖經的重要性，我們也有必要對其做一簡單介紹。

希伯來文的經書被譯為希臘文，這現象既顯示了經書本身的重要性，也顯示了對如何在另外的文化中生活出猶太人的信仰的反省。Gilles Dorival 指出，如此重要的行動一定是來自巴勒斯坦的猶太信仰團體官方的決定，他們如此做，是為了回應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人團體在文化、教育及護教方面的潛在需要。²⁰

希臘七十賢士譯本問世後，在猶太團體中很受歡迎，猶太哲學家費羅 (Philon d'Alexandrie, 主前 20 年 ~ 主曆 45 年) 和史學家約瑟夫 (Flavius Josèphe, 37~100) 都很重視此譯本，並在他們的著作中加以引用。²¹ 費羅更宣稱這些譯者是猶太的司祭及先知，並且記載說在翻譯的工程結束後，在法羅斯島 (Pharos) 上每年

¹⁹ Cf. Innocent Himbaza, "La critique textuelle de l'Ancien Testament et son application dans les éditions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in Innocent Himbaza et Clement Locher (éd.), *La Bible en face, Etudes textuelles et littéraires offertes en hommage à Adrian Schenker, à l'occasion de ses quatre-vingts ans*, Cahier de la Revue Biblique 95 (Leuven-Paris-Bristol: Peeters, 2020), pp. 9~10.

²⁰ Cf. Marguerite Harl, Gilles Dorival, Olivier Munnich, *La Bible grecque des Septante. Du judaïsme hellénistique au christianisme ancien* (Paris: Cerf, 1988), p. 78.

²¹ 參：思高聖經學會，《聖經簡介》，52 頁。

都會舉行節日以示慶祝。²²

然而在主曆一世紀末期，猶太團體，尤其在巴勒斯坦境內，開始因為希臘文譯本質量不好²³，而逐漸趨向拋棄七十賢士譯本。例如猶思定（Justinus，100~165）在他的護教學著作《與猶太人 Tryphon 的對話》（*Dialogue avec Tryphon*）中，便指出猶太人如何批評希臘七十賢士譯本的質量，並認為基督徒在裡面添加了內容。²⁴ 事實上，猶太團體在制定他們的聖經綱目時，最終放棄了七十賢士譯本，以致在他們的聖經綱目中，不包含用希臘文寫成或僅存希臘文譯文的經書。

然而七十賢士譯本一直都受到基督徒的重視，不僅是新約的寫作大量引用七十賢士譯本，後期的教父，諸如里昂的依肋內（Iréne de Lyon，130~202）、亞歷山大的克來孟（Clément d'Alexandrie，150~215）、米蘭的盎博羅削（Ambroise de Milan，340~397）、希波的奧斯定（Augustin d'Hippone，354~430）等都擁護七十賢士譯本，並認為此譯本是在天主的默感下譯成的。²⁵

²² Cf. Marguerite Harl, Gilles Dorival, Olivier Munnich, *La Bible grecque des Septante. Du judaïsme hellénistique au christianisme ancien*, p. 119.

²³ 《德訓篇》的譯者在序言中也已經陳明希伯來文相對希臘文的優越性。

²⁴ Cf. P. Bobichon, *Justin Martyr, Dialogue avec Tryphon, Edition critique, traduction, commentaire*, 2 vol (Fribourg: Département de Patristique et d'Histoire de l'Eglise de l'Université de Fribourg/Academic Press, 2003), pp. 382~385, 414~416, 430~431, 770~772, 794~795, 810~812.

²⁵ 參：思高聖經學會，《聖經簡介》，52頁。

儘管如此，七十賢士譯本文本本身的問題並不能被忽略，這也是為何很早期就出現了新的嘗試，有人開始重新翻譯或修訂既有的希臘譯本，例如阿桂拉譯本（Aquila，約 140 年）、特熬多削譯本（Theodotion，約 180 年，是對七十賢士譯本的修訂本）及息瑪苛譯本（Symmachus，約 200 年）。主曆 300 年左右，Pamphile 和 Eusèbe 在凱撒利亞（Césarée）、Lucien 在安提約基雅（Antioche）、Hésychius 在埃及，都對七十賢士譯本進行了修訂。但是沒有哪一個修訂本可以自認是完美的。而在這之後，直到印刷術出現以前，人們所做的更多是對這些譯本的抄錄而已。²⁶

上文已經提過，在現存的七十賢士譯本抄本中，最著名的應該是梵蒂岡抄本（Vaticanus，主曆四世紀）、西乃抄本（Sinaiticus，主曆四世紀）和亞歷山大里亞抄本（Alexandrinus，主曆五世紀）。一方面是這些著名的古老抄本得以保留；另一方面，這些抄本的抄本也在不同的世代得以延續。

印刷術發明後，抄本的時代也告結束。1587 年，教宗西斯篤五世（Sixtus PP. V，1521~1590）在位時，出版了對七十賢士譯本的修訂本，被稱為「西斯篤版本」。負責修訂此版本的是加拉法樞機（Antonio Carafa，1538~1591）及由他領導的委員會，其中包括聖羅伯博敏（Roberto Bellarmino，1542~1621，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的主保）²⁷。這個七十賢士譯本修訂本建基在梵蒂岡抄本（Vaticanus）

²⁶ Cf. Innocent Himbaza, “La conscience des problèmes textuels de l’Ancien Testament. Etat de la question hier et aujourd’hui”, p. 53.

²⁷ 參：崔寶臣，〈學者聖博敏〉，《神學論集》202 期（2019 冬），513 頁。

的基礎上，而對於本抄本殘缺的部分（主要是《創世紀》及詠一〇六到一三八），他們參考了其他的抄本。但他們並未完全忠實地跟隨梵蒂岡抄本，比如關於《依撒意亞》先知書人們找到了 400 多不同之處，而對於整部舊約來說，則有 4000 多處異文。²⁸

1707 年，John Ernest Grabe 在英國出版了建基在亞歷山大里亞抄本 (Alexandrinus) 的基礎上的七十賢士譯本。1798 到 1827 年，英國牛津的 Robert Holmes 分冊出版了七十賢士譯本的評析版本，特色是他沒有選擇某一個抄本，而是使用了多個不同的抄本做底本。跟隨同樣的邏輯，德國的 Paul de Lagarde²⁹ (1827~1891) 認為沒有哪一個抄本是完美的，應該意識到並使用所有的抄本，所以他計畫出版七十賢士譯本的「折衷版本」。並且他還定下了另外的原則，就是偏好自由翻譯的抄本而不是字面直譯的，偏好與瑪索辣文本 (TM) 不同的抄本，而不是與之契合的抄本。但是在他去世前，他的工程尚未完成。1883 年在英國的劍橋興起了出版七十賢士譯本評析版本的計畫，他們選擇了梵蒂岡抄本 (Vaticanus) 做藍本，認為是七十賢士譯本最好的抄本。此計畫的特色是，他們在書的註解中引入了其他所

²⁸ Cf. H. B. Swet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0, reprint in 1989), pp. 181~182; Innoncent Himbaza, “La conscience des problèmes textuels de l’Ancien Testament. Etat de la question hier et aujourd’hui”, p. 53.

²⁹ 出生在德國柏林，原名為 Paul Anton Bötticher，後追隨法國籍外祖母的姓，改名為 Paul de Lagarde。

有的抄本。1906年出版了第一冊，但此計畫後來被擱置。

目前人們使用最多的是 Paul de Lagarde 的學生 Alfred Rahlfs 所負責出版的七十賢士譯本³⁰。這是一個折衷版本，建基於三個最重要的抄本上，即：梵蒂岡抄本（Vaticanus）、西乃抄本（Sinaiticus）及亞歷山大里亞抄本（Alexandrinus）。³¹ 其實在 Rahlfs 出版七十賢士譯本之前，在德國的哥廷根（Göttingen）於 1907 年已經成立了一個「七十賢士譯本研究團隊」（Septuaginta-Unternehmen），計畫出版七十賢士譯本評析版本多冊本，而此系列的第一冊便是由 Alfred Rahlfs 負責出版的《聖詠集》。³² 但目前為止，除了《盧德傳》和《創世紀》已經出版外，其他書的出版日期都還沒有消息。

不僅有七十賢士譯本抄本的出版，需要提一下的還有七十賢士譯本的現代語言譯本。法語的《亞歷山大里亞聖經》（*La Bible d'Alexandrie*）是一個龐大的翻譯出版計畫，自 1986 年出版了第一本《創世紀》後，目前一直都在進行中。此系列的核心原則有下列幾點：1）譯文緊隨希臘原文；2）指出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不同的地方；3）在七十賢士譯本的背景中詮釋這些不同之

³⁰ *Septuaginta: id est Vetus Testamentum graece iuxta LXX interpretes*, 2 vols (Stuttgart: Privileg. Württembergische Bibelanstalt, 1935) .

³¹ 關於七十賢士譯本抄本出版歷史的更詳細介紹，參：Innoncent Himbaza, “La critique textuelle de l’Ancien Testament et son application dans les éditions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pp. 52–55.

³² Alfred Rahlfs (éd.), *Psalmi cum Odis*, Septuaginta 1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31) .

處；4) 參考古代對七十賢士譯本的閱讀與詮釋，尤其是教父著作。³³ 在法文的翻譯計畫興起後，其他語種的譯文也緊隨其後，並相繼問世：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德文等等；有趣的是，法文譯本的全部竣工卻還遙遙無期。

四、拉丁文聖經

在西方教會，拉丁文聖經從開始就佔據了幾乎整個聖經世界的舞台。當教宗達瑪森 (Damasus I, 305~384) 看到當時教會內，各種拉丁聖經文本質量參差不齊時，要求熱羅尼莫 (Hieronymus, 340~420) 從事修訂的工作。熱羅尼莫先是修訂新約，工作還算順暢，但是當他開始修訂舊約時，情況變得複雜起來。因為他當時面對的是在教會內流行的古拉丁譯本，同時還有希臘文的七十賢士譯本及其他譯本，和希伯來文原文聖經，多處經文的差異讓他偏向 *Veritas Hebraica* (希伯來文的真理)，後來他決定親自從希伯來文原文翻譯成拉丁文。但他並沒有完全拋棄七十賢士譯本，因為他知道，新約作者在編輯新約時參考的正是這個譯本。³⁴

不僅熱羅尼莫，同時代的奧斯定也意識到聖經不同文本的

³³ Cf. Marguerite Harl, "La Bible d'Alexandrie. I. The Translation Principles", in B. A. Taylor (éd.), *X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eptuagint and Cognate Studies* (Atlanta: GA, 2001), p. 183.

³⁴ 關於熱羅尼莫所修訂的聖經以及如何後世成為教會內的「通行本」，請參：思高聖經學會，《聖經簡介》，54~58 頁。

問題。然而他反對當時一些學者的意見，認為聖經雖有不同的版本和文本，但都是受聖神的默感而寫成，儘管在某些地方它們所描述的有很大的區別。³⁵ 他的這種觀點，和奧利振的「六欄經」的用意是一致的。有趣的是，當奧斯定面對具體的經文時，比如《約納》書中關於尼尼微城的毀滅（納三 4），按希伯來文版本是四十天（יום ארבעים），而按七十賢士譯本是三天（τρεις ἡμέραι），奧斯定認為希伯來文版本所記載的「四十天」才更為可取。在其他很多存在異文的地方，奧斯定也是採用一樣的立場，就是更偏向希伯來文³⁶。這樣的做法，讓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態度，也就是，一方面承認其他文本和版本的合法合理性，另一方面偏向希伯來文的原始性。

在熱羅尼莫和奧斯定之後，拉丁文聖經一直都是教會禮儀和閱讀及研究聖經所使用的版本。直到中世紀，再到文藝復興時期，教會內的共識都是聖經文本（更好說是拉丁文聖經）就是聖經，意思是說，從各個層面講，我們都應該相信，它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³⁷ 然而，這並沒有妨礙一直有人意識到拉丁聖經文本的諸多問題，而嘗試修正，儘管有時這種做法會被認為是

³⁵ Cf. Saint Augustin, *La Cité de Dieu*, XVIII, 42-45, *Oeuvres Complètes*, vol. 24 (Paris: Louis Vivès, 1873), pp. 461-465.

³⁶ Cf. Innoncent Himbaza, "La critique textuelle de l'Ancien Testament et son application dans les éditions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p. 45.

³⁷ Cf. Thomas Römer, "La formation du Pentateuque selon l'exégèse historico-critique", in C. B. Amphoux et J. Margain (éd.), *Les premières traditions de la Bible, Histoire de la Bible 2* (Lausanne: Zèbre, 1996), p. 22.

犯大罪。³⁸ 特利騰大公會議時（1545~1563），與會教長意識到衆多不同的拉丁文本所帶來的困擾及危險，所以決定修訂拉丁通行本。上文提到的加拉法樞機（Antonio Carafa, 1538~1591）及由他領導的委員會不僅負責修訂七十賢士譯本，更重要的是，他們要負責修訂拉丁通行本。

但是，拉丁通行本的修訂過程相對來說，更爲曲折複雜。³⁹ 先是教宗西斯督五世（Sixtus V, 1521~1590）去世前不久得以出版的《西斯督五世拉丁通行本聖經》（*Biblia Sacra Vulgatae Editionis Sixti V*, 1590），但因爲修訂不完善，繼任教宗繼續修訂，終於在克肋孟八世教宗任期內得以付梓，被稱爲《西斯督五世—克肋孟八世拉丁通行本聖經》（*Biblia Sacra Vulgatae Editionis Sixti V et Clementis VIII*, 1592）。這個拉丁通行本一直都是天主教會內的官方版本，直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時，再次被要求加以修訂，並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任時出版，稱爲《新拉丁通行本》（*Nova Vulgata*, 1979）。

五、多語種對照聖經（Bible Polyglotte）

儘管上面所提到的三個希伯來文聖經及七十賢士譯本的出版計畫均尙未全部完成，已有學者提議出版多語言對照版本，認爲這樣才可以擁有一本更好的、帶有文本考證性質的聖經版

³⁸ Ceslas Spicq,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l'exégèse latine au Moyen Age*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1944), p. 372.

³⁹ 關於修訂拉丁通行本的更多細節，參：崔寶臣，〈學者聖博敏〉，513~515頁。

本。其實這樣的想法並不是現代的產物，主曆三世紀時，奧利振 (Origène, 185~253) 已經意識到聖經文本的問題，而想出了「六欄經」(Hexaples) 的辦法，就是在同一部舊約聖經中並列排放六個「版本」：希伯來文、以希臘字母發音拼寫的希伯來文、阿桂拉譯文 (Aquila)、息瑪苛譯文 (Symmachus)、七十賢士譯文 (Septuaginta)、特熬多削譯文 (Theodotion)。

奧利振之後，西方教會在印刷術出現之前，也許不是出於聖經文本考證的理由 (因為一些多語種聖經既不包含希伯來語，也不包含希臘語)，而更好說是禮儀上使用的原因，所以尤其是聖詠集，也曾以多語種形式呈現，例如抄寫於 1150 年左右的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 的三語聖詠集 (希臘語、拉丁語、阿拉伯語)，及抄寫於十四世紀的梵蒂岡圖書館 (Vatican Library) 的五語聖詠集 (埃塞俄比亞語、敘利亞語、科普特語、阿拉伯語、亞美尼亞語)。而第一本印刷出版的多語種聖詠集，是 1516 年由道明會士 Agostino Giustiniani 所出版的五語聖詠集 (拉丁語、希伯來語、希臘語、加色丁語、阿拉伯語)。⁴⁰

第一部印刷的多語種完整聖經，是由西班牙樞機 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 (1436~1517) 於 1514 到 1517 年所完成、但是到 1520 年時才發行的阿爾卡拉多語種聖經 (Bible polyglotte d'Alcalá)。共有六卷，舊約四卷，新約兩卷。舊約部分有希伯

⁴⁰ 關於這部分，參：Innocent Himbaza, "La conscience des problèmes textuels de l'Ancien Testament. Etat de la question hier et aujourd'hui", pp. 50~52.

來語、阿拉美語、希臘語和拉丁語。在這之後，有知名印刷商 Christophe Plantin (1520~1589) 於 1568~1572 年在比利時安特衛普 (Antwerpen) 出版的多語種聖經，共九卷，前六卷和阿爾卡拉多語種聖經相同，後三卷的內容是聖經中所包含之語言的詞彙表及語法。再有就是 1628~1645 年出版的巴黎多語種聖經，共九卷，前四卷為舊約，第五卷為新約，第六到第九卷分別是《撒瑪黎雅五書》⁴¹、《撒瑪黎雅五書》的塔爾古木 (Targum)、舊約的敘利亞譯文及阿拉伯譯文。第四部比較著名的是於 1653~1657 年出版的倫敦多語種聖經，共六卷，舊約部分與巴黎多語種聖經相同，但是改正了其中的部分錯誤。⁴²

多語種聖經帶來的好處是面對不同語言文本，對每一個原文字句在不同語言中的呈現可以一目了然。看到不同之處時，可以引發更深入的研究與思考。這樣的做法當然是語種越多，優勢越大，但是因為目前所擁有的文本數量之眾，於今日出版一本多語種聖經亦會有多重困難。為了閱讀上的方便，於是

⁴¹ 這是第一次在一本多語種聖經中，包含了《撒瑪黎雅五書》，因為猶太人曾公開詛咒這本書，以致讓它沉默了很久。Cf. J. P. Rothschild, "Autour du Pentateuque Samaritain. Voyageurs, enthousiastes et savants", in J. R. Armogathe (éd.), *Le Grand Siècle et la Bible, Bible de tous les temps* 6 (Paris: Beauchesne, 1989), pp. 61~74.

⁴² 關於這四部重要的多語種聖經的歷史，參：Adrian Schenker, "Der alttestamentliche Text in der vier grossen Polyglottenbibeln nach dem heutigen Stand der Forschung", *Theologische Revue* 90 (1994), col. 177~188.

學者建議出版多語種「數碼版本」⁴³；它的優勢顯而易見：便於查閱，當有新的內容時亦便於更新。這是任何印刷版本所無法比擬的。當然，多語種聖經也有它的限度，因為某些書（例如《出谷紀》或《耶肋米亞先知書》）的瑪索辣文本和七十賢士譯本的章節順序有所不同，所以對照閱讀時會有其難處。

六、文本考證

前述介紹目前世界上正在進行中的希伯來文聖經出版計畫時，已提到文本和文本考證的概念；同時也正因為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和解決辦法的不同，才滋生了不同的出版計畫。為此，以下將嘗試介紹一下到底什麼是對舊約經文的文本考證，和它的起源與發展。

當人們面對聖經不同的文本時，自然會想知道哪一個文本才是最原始，或者更好說是最接近原始的文本。這不僅對翻譯聖經的人，而且對所有想認真研究聖經的人，都極其重要。上文提到的奧利振已經意識到這個必要性，而且以他的方式嘗試解決這個疑難。在他的「六欄經」中，在「七十賢士譯本」那一欄，他詳細標註了希臘譯文與希伯來文原文經文中的異同。奧利振也因而被學者稱為聖經文本考證之父。⁴⁴

⁴³ Cf. Innoncent Himbaza, “La critique textuelle de l’Ancien Testament et son application dans les éditions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p. 14. 事實上，很多為平板電腦和手機開發的軟體或應用，已經具備這種形式，例如 Bibleworks、Concordance 等等。

⁴⁴ Cf. Henning Graf Reventlow, *Epochen und Bibelauslegung, Band I*,

其實在奧利振之前，意識到文本問題並加以考證的現象已經出現。Dominique Barthélemy (1921~2002)⁴⁵ 稱此工作為「recension」(校訂)，並認為在主前就存在了。⁴⁶ 例如在死海上游的 Wadi Seyal 所發現的希臘文的《十二小先知書》(Dodécaprophéton) 中，就有透過希伯來文範本來修改希臘譯文的痕跡。⁴⁷ 而三世紀時，奧利振透過「六欄經」的做法，本也是為得出最理想的七十賢士譯本文本。然而熱羅尼莫(四世紀末到五世紀初)，他最後放棄了修訂既有的拉丁文譯本(因為他認為錯誤實在太多)，而是自己直接從希伯來文翻譯為拉丁文。他這

Vom Alten Testament bis Origenes (München: Beck, 1990), p. 171; Françoise Petit, "La chaîne grecque sur la Genèse, miroir de l'exégèse ancienne", in G. Schöllgen, C. Scholten (éd.), *Stimuli. Exegese und ihre Hermeneutik in Antike und Christentum. Festschrift für Ernst Dassmann*, Jahrbuch für Antike und Christentum 23 (Münster: Aschendorff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96), p. 246.

⁴⁵ 法國道明會士，生前任教於瑞士弗立堡大學(Université de Fribourg)，畢生研究舊約聖經文本考證，並出版多冊專著，享譽世界。他去世後，弗立堡大學於 2009 年以他的名字成立了研究院(Institut Dominique Barthélemy)，專門研究聖經文本歷史及文本考證。

⁴⁶ Cf. Adrian Schenker et Philippe Hugo, "Histoire du Texte et Critique Textuelle de l'Ancien Testament dans la recherche récente", in Adrian Schenker et Philippe Hugo (éd.), *L'enfance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Histoire du texte de l'Ancien Testament*, Le monde de la Bible 52 (Genève: Labor et Fides, 2005), p. 11.

⁴⁷ Cf. Dominique Barthélemy, *Les devanciers d'Aquila. Première publication intégrale du texte des fragments du Dodécaprophéton*, Vetus Testamentum Suppléments 10 (Leiden: Brill, 1963).

樣的做法是走捷徑，意思是，他放棄重組看起來更為可靠的七十賢士譯本（拉丁古譯本所依據的版本）以來修訂既有的拉丁譯本。從六世紀到中世紀，瑪索辣學士（Masorete）爲了避免不斷抄寫時的錯誤，確定了他們認爲最可靠的希伯來文聖經文本，並且加上了元音（母音）和重音符號，以及關於重要字詞的注釋，奠定了我們今日所稱的「瑪索辣文本」（Texte Massorétique）的基礎。

前面關於希伯來文聖經、希臘文聖經及拉丁文聖經，從開始到現在，一個接一個的版本，讓我們看到的是從來沒有中斷的文本考證的努力。每一個「考證」版本都竭力出示最少錯誤的經文，不論這些錯誤是來自抄寫時的無意或是不合理的改寫。當然，也有些「改寫」是出自神學或文學的理由⁴⁸，這在經文的歷史傳承中實屬正常。但是這樣的情況只能發生在當經文被信仰團體官方認定之前⁴⁹，因爲一經認定，任何人都不再被准許改寫或添加任何經文字句，遇到疑難，也只能加以解釋了。

所有文本考證的努力都是嘗試找到最原始或最接近原始的

⁴⁸ Cf. Innocent Himbaza, “La critique textuelle de l’Ancien Testament et son application dans les éditions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p. 4.

⁴⁹ René Pftzfel 在他的博士論文 *Les Tiquané Sopherim clandestins présents dans le texte massoretique de la Bible hébraïque*（《希伯來聖經瑪索拉文本中未曾公開的經師修改》），sous la direction de Jan Joosten, soutenue en 2004 à l’Université Marc Bloch, Strasbourg) 中，尤其探討了聖經成爲正典之前（第二聖殿時期），聖經希伯來文文本所可能經歷的修改。

經文，或者說找到現代聖經經文的「原型」(Archétype)⁵⁰。這樣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各種文本所呈現的異文現象。今日學界認為全部舊約 10%的經文是「考證」的對象，這一推測建基在現代希伯來聖經版本(例如 BHS)平均每十個字就有一個字帶有注釋。⁵¹ 但是「文本考證」作為一個學科，從誕生到現在也經歷了一系列的調整和發展。當「舊約希伯來經文計畫」(HOTTP, Hebrew Old Testament Text Project)於 1969 年開始，歷經十年後，他們共探討了 5000 個文本問題⁵²，而且很快就意識到找到所謂的「經文原型」是無法實現的事情。⁵³ 學者們努力的目標不再是找到真正意義上的「原始經文」，而是透過所有現存

⁵⁰ Cf. Adrian Schenker, *Une Bible archétype? Les parallèles de Samuel-Rois et des chroniques*, L'écriture de la Bible 3 (Paris: Éditions du Cerf, 2013), pp. 15~36.

⁵¹ Cf. B. K. Waltke, "How we Got the Hebrew Bible: The Texte and Canon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P. W. Flint (éd.), *The Bible at Qumran. Text, Shape,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Grand Rapids, Michigan/Cambridge, UK: Eerdmans, 2001), p. 48.

⁵² Cf. Aadrian Schenker, "La préparation de la *Critique textuelle de l'Ancien Testament* (1982~2015): Le *Hebrew Old Testament Text Project* (1969~1979)", in A. Schenker, C. Locher, H.G.M. Williamson: *Un maître de la critique textuelle: Dominique Barthélemy. L'édition de la Critique textuelle de l'Ancien Testament* (1982~2015), CRB 91 (Leuven / Paris / Bristol, CT: Peeters, 2018), pp. 1~22.

⁵³ Cf. Emmanuel Tov,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2), p. 167.

的文本，分辨出可能最爲古老的經文。

儘管如此，學者們的意見還是有分歧。有人認爲，「假設」在文本考證中有它的一席之地（這是主導出版希伯來聖經「折衷」版本的原則）。而更多學者則認爲應該意識到多元文本本身的複雜性，更好尊重各個版本的不同傳承歷史（這是主導出版希伯來聖經「標準」版本的原則）。這樣的分歧會影響現代語種聖經的翻譯。如果「折衷」版本中的某些經文來自「假設」，很難想像如何把現代語言的聖經翻譯建立這樣的文本上。而「標準」版本（比如 BHQ）的目標之一，就是出版一本供人閱讀和翻譯的版本。⁵⁴

七、中文聖經譯本

聖經譯爲中文由來已久，中文聖經譯本數目之衆令人訝異，而其本身已經構成譯文文本考證的材料。趙曉陽在她的博士論文《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爲中心》⁵⁵ 的附錄中（265~284 頁），羅列了 31 個中文譯本的一個具體段落（若一 1~20），展現了一幅很好的對照閱讀資料範例。而蔡錦圖博士以他近 700 頁的巨著《聖經在中國，附中文聖經歷史目錄》⁵⁶，整理了過去數百年天主教、東正教及基督新教的中文聖經翻譯成果，也讓我們得以窺見中文聖經翻譯的漫長歷史。⁵⁷

⁵⁴ Cf. Innoncent Himbaza, "La critique textuelle de l'Ancien Testament et son application dans les éditions de la Bible Hébraïque", p.17.

⁵⁵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19）。

⁵⁶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 49（香港：道風書社，2018）。

⁵⁷ 介紹聖經中譯歷史的文章和著作也可參：Piet Rijks 著，黎明輝、

聖經譯為中文，一方面方便了華人基督徒的應用，同時作為中國語言文字演變的「域外資源」，在一定程度上為中文「提供了走出自我封閉、拓展自身的新機運、新參照和新內容，提供了飽含現代意義的語言文字變革途徑。」⁵⁸ 聖經中譯尤其為很多方言和漢族外某些民族語言的文字化，帶來了不可磨滅的貢獻。⁵⁹

中文聖經翻譯特色。縱觀所有中文聖經譯本，可以看到下列幾個特色：1) 在選擇所要翻譯的文本上，天主教方面先是選擇拉丁通行本 (Vulgata)，因為這是當時教會通行使用的語言，這情況一直到思高聖經譯本才改為由聖經原文 (希伯來文、阿拉美文和希臘文) 進行中譯；2) 翻譯者最初都是外籍傳教士，也就是說，中文並非他們的母語⁶⁰，他們的譯本的質量在很大程度

袁志雄、黃翠芬、陳翠欣譯，〈聖經在中國的歷史〉，《神思》89 期 (2011)，73~102 頁；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聖經的中文翻譯》，天主教研究學報，第二期 (2011)。

⁵⁸ 趙曉陽，《域外資源與晚晴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261 頁。趙曉陽博士在專著中特別選了 18 個因聖經中譯而進入中國的新詞語做了分析，包括：耶穌基督、亞當夏娃、摩西、猶太人、耶路撒冷、伊甸園、十字架、福音、洗禮、先知、聖靈、天使、五旬節、安息日、阿們、彌賽亞、撒旦、以馬內利。

⁵⁹ 參：趙曉陽，《域外資源與晚晴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160~243 頁。

⁶⁰ 學者們只有在介紹白日升 (Jean Basset, 1662~1707) 譯本時，提到有一位中國基督徒徐若翰 (Jean Xu, ?~1734) 幫忙翻譯聖經。參：蔡錦圖，《聖經在中國，附中文聖經歷史目錄》，34~35 頁。而趙曉陽在提到徐若翰時稱之為神父，參：趙曉陽，《域外資源

上，取決於他們對中文掌握的程度；3）在所使用語言上，最初多為文言（深文理）譯本，過渡到半文半白（淺文理）譯本，再到後期的白話譯本，當然也不能忽略還有很多方言譯本；4）從事譯經工作的，或者是個人，或者是團隊。

中文譯本雖然衆多，但至目前為止，在華人世界最具權威的兩個譯本，一是天主教的「思高聖經」譯本，一是基督新教的「和合本」。思高聖經，由意大利方濟會士真福雷永明神父（Gabriele Allegra, 1907~1976）於 1935 年獨力開始，後和幾位中國神父創立「思高聖經學會」（1945），繼續聖經的翻譯工作，於 1968 年第一版聖經完整版問世。其後多次再版，最新版是 2015 年紀念思高聖經學會成立 70 週年版，但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修訂版。思高聖經學會在其第一版的序言中詳細介紹了其譯本所選擇的原文文本及理由。這是迄今為止，天主教所有譯本中，一本真正依照聖經原文文本翻譯的中文版本，而且主要是由中國人完成的。當然，選取原文的理由和方法也有可商榷之處，例如有關《德訓篇》的翻譯，雖然主要譯自希臘文，而且參考了當時考古發現的希伯來文殘卷，但同時亦保留了拉丁通行本所多出的詞句（以楷書體排印）；而且全書的章節，亦是跟隨拉丁通行本。按思高聖經學會同仁的想法，這是尊重教會在歷史中一直使用拉丁通行本的習俗；但問題是，當有人參照閱讀別的版本時，則帶來很大的困擾。例如同為天主教譯本的法文 *La Bible de Jérusalem* 和英文 *New American Bible* 的《德訓篇》則

都是選擇希臘七十賢士譯本作為底本，而且章節也追隨希臘文。

基督新教的和合本聖經迄今已過百年，其誕生經歷可謂曲折。由最初的「聖經唯一，譯本則三」，指當時的文言文（深文理）、半文半白（淺文理）和官話（白話文）三個譯本，而且還分「上帝」版和「神」版；但最後還是「官話和合譯本」（1919）得到最大程度的推行，至 1939 年改名為「國語和合譯本」，後簡稱「和合本」，它一直是基督新教最被使用的譯本。這個譯本的起源也是來自外國傳教士，但翻譯過程中也有中國基督徒的協助。「和合本」隨英語修訂版聖經（English Revised Version）所使用的原文底本。它的出現趕上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運動，對中國白話文的普及和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以直譯為基本翻譯方式的白話聖經，影響到幾乎所有現代著名作家和文學家。幾乎所有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現代白話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如魯迅、郁達夫、郭沫若、許地山、林語堂、田漢、成仿吾、冰心、聞一多、老舍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聖經的語言。⁶¹

聯合聖經公會於 1983 年計畫修訂「和合本」，1984 年制定根據原文並參考其他譯本的修訂原則，並力求以通順自然的中文來表達。1985 年在台灣展開修訂工作，2000 年完成新約，並從這一年開始，聯合聖經公會將「和合本」的修訂及出版交

⁶¹ 趙曉陽，《域外資源與晚晴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157 頁。

給香港聖經公會，2010 年全部竣工，出版整部新舊約全書。⁶² 此修訂版的一大特色，是由以中文為母語的聖經學者完成的。

八、以法文 TOB 和 BEST 為例

TOB 是 *Traduction Œcuménique de la Bible*（聖經大公譯本）的縮寫，是包含各基督宗派的法文版共同譯本。⁶³

TOB 的創意由來已久，法國神父 Richard Simon⁶⁴（1638~1712）在十七世紀時，已萌發了這樣的想法，但因各種原因，計畫擱淺。直到廿世紀天主教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受《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Dei Verbum*, 1965）的鼓勵，這個計畫再次浮出水面。由耶路撒冷聖經學院的聖經教授主導，邀請各基督宗派的聖經學者參與。開始時，因為只有兩位東正教聖經學者參與，所以在 TOB 第一版（1975）和校正版（1988）中只

⁶² 參：蔡錦圖，〈《聖經在中國，附中文聖經歷史目錄》，414~415 頁；蔡錦圖，〈從《和合本》到《和合本修訂版》〉，《神思》89 期（2011），35~40 頁。

⁶³ 我們在這裡選擇介紹法文版的大公版本 TOB，並不排除其他語言版的大公版本，只是同類大公版本中，法文版的 TOB 實為最傑出之作。關於其他語言的大公版本，參：房志榮，〈新約全書「現代中文譯本的來龍去脈」〉，《神學論集》26 期（1976），609~621 頁。房志榮神父在其文中也稱法文版的 TOB 為「精心傑作」，只是那時他還沒有看到 2010 年 TOB 的修訂版，否則他一定更會讚歎有加！

⁶⁴ 宗座聖經委員會稱之為現代聖經詮釋的奠基人，參：Commission Biblique Pontificale, *Interprétation de la Bible dans l'Eglise* (Paris: Les Editions du Cerf, 1999), p. 28.

有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聖經綱目所包含的書目，直到 2010 的修訂版才加入了東正教聖經綱目中的書目（《瑪加伯》卷三、四；《厄斯德拉》卷三、四；《默納協的祈禱》；詠一五一）。在它的首頁標明了構思、編輯及協調者的名字，共 40 位；參與翻譯者的名字，共 114 位；並且也標明了譯者們所使用的原文版本聖經。序言中也詳細講述了這一宏偉計畫的產生及所經歷的過程。在基督教會的歷史上，這的確是首創，意義非凡。⁶⁵ 因為基督徒的分裂始於對聖經的不同意見，而能夠共同翻譯注釋聖經，則是走向合一的美麗步伐。

因為 TOB 翻譯的質量，及其所持守的翻譯原則，讓這本聖經成爲法語界聖經學者最多使用的譯本，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它超越了所有至此現有的法文翻譯」⁶⁶。

BEST 是 *La Bible en Ses Traditions*（傳承中的聖經）的縮寫。但在了解 BEST 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它的前身：《耶路撒冷聖經》（*La Bible de Jérusalem*）。由耶路撒冷聖經及考古學院負責翻譯，先是於 1948 年到 1955 年以單行本發行，於 1956 年出版第一版完整本。參與翻譯的共有 33 位（聖經首頁標有他們的名字），其中包括道明會士、耶穌會士、本篤會士等等，都是當時法語界最爲傑出的聖經學者。1977 年出第二版修訂版，1998

⁶⁵ Cf. Jean-Marie Auwers et collaborateurs, *La Bible en Français, Guide des traductions courantes* (Bruxelles: Lumen Vitae, 2002), p. 56.

⁶⁶ 包智光 (François Barriquand) 著，陳嘉敏譯，〈比較白、徐和馬禮遜有關羅馬人書 1~4 章翻譯文本：新約合一譯本的試驗案例〉，《神思》89 期（2011），16 頁。

年出第三版修訂版。其翻譯質量從開始便得到世界公認，第一版發行後很快就滋生了英語版的 *Jerusalem Bible* (1966)，譯本、導言和注釋都是跟隨法語的耶路撒冷聖經版本。⁶⁷

進入第廿一世紀後，耶路撒冷聖經及考古學院意識到再版其聖經的必要性。但是這次他們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嘗試，就是自 2010 年所開始的 BEST 計畫。如果說聖經翻譯本身就是詮釋的話，那麼 BEST 想呈現給讀者的，則不再是一個單一的文本，而且包含從聖經文本誕生之初，它所經歷的詮釋過程，讓聖經文本和教會的生活傳統做完美的連接。

它的另一特色是數碼形式，並且是合作參與模式，也就是邀請世界各地的聖經專家學者參與。目前已開出 29 個注釋欄，包括：猶太文化、教父學、古代近東、考古學、禮儀、神學、古代與現代文學、藝術史等等，可以說無一不包，因為這一切都是聖經的世界，或者說構成聖經寫作和解讀的背景。

今日可說正是處於數碼時代，重新構思多語種聖經的新形勢，可有不同的嘗試。出版聖經不能再滿足於一個單一的語言版本，人們對各種原文版本的認知，讓我們看到聖經經文本身的多元性，在不同的信仰團體中，這些版本的傳承也讓我們看到經文本身的活力。不僅透過不同的語言、不同的版本，也透過不同的神學著作、禮儀生活、文學作品、藝術創作等等，看

⁶⁷ 思高聖經中沒有介紹是否參照法語版耶路撒冷聖經，但筆者猜測可能性很大。希望以後有人可以比較這兩個版本，做這方面更深入的研究。

到聖經給人類帶來持續不斷的靈感與驚喜。

BEST 的計畫是龐大的，我們無法知道何時是終點。但這正如聖經文本的傳承本身，我們在期待中繼續我們閱讀和詮釋的旅程。

看到法語版的 TOB 和 BEST 計畫，會給聖經中譯帶來哪些啓發呢？

九、結語：對聖經中譯的展望

(一) 翻譯本身

「翻譯是建立在對不同語言之間假定存在對等關係基礎上的文化活動，即在共同認可的等值關係的基礎上，將一種文化的語言翻譯成另一種文化的語言」⁶⁸。但同時不得不承認，對等關係並不排除創新的可能性。也誠如《德訓篇》的希臘譯本序言所說：「希伯來文的著作，一譯成他國的文字，便不易保持其原有的氣魄」。所以在以「信、達、雅」為翻譯原則的情況下⁶⁹，譯經時所需要的創新實屬難免甚至必須。前文所提到

⁶⁸ 趙曉陽，《域外資源與晚晴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259 頁。

⁶⁹ 雖然亦有不同的聲音，但學界一般還是將此一翻譯理論歸中國著名的作家與翻譯家嚴復（1854~1921）：信，指譯文要準確，不增減；達，指譯文不拘泥於原文格式；雅，指譯文要得體且優雅。而且嚴復將對「信」的追求放在了首位。參：趙曉陽，《域外資源與晚晴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80、259 頁。思高聖經學會在譯經初期也定下了「信、達、雅」的翻譯原則，而且以「信」為主，「達」為次，「雅」則不及前兩者重要。然而在

聖經中譯對中國語言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正是這一事實的作證。其實，早在聖經中譯之前，聖經翻譯對歐洲很多國家語言的誕生與發展，也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引導與推進作用。例如馬丁路德把聖經譯為當時的德語方言，使之淺顯易懂，此舉對德國語言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又或英語欽定版聖經（King James Version, KJV, 1611）對英國語言與文學的深遠影響，等等。

其實，各種語言重要譯本的修訂，一方面是因為更多古代文獻的出土，及對聖經原文的更全面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每一種現代的生活語言，都在隨著時代而有所變化。基督新教的「和合本聖經」於 2010 年所完成的修訂，就是一個好的範例。那天主教的「思高聖經」呢？

思高聖經學會當然已經意識到出版「思高聖經」修訂版的必要性。其現任會長黃國華神父於 2008 年已經籌劃並展開修訂「思高聖經」的工作，而且以新約開始。只是他提出新約修訂版本的翻譯原則時⁷⁰，其中兩點頗令人費解。一是回歸「思高聖經」初譯時所規定的「信、達、雅」以「信」最優先，其次是「達」和「雅」，而不再按照出版完整版時「信、達、雅」均顧的修訂原則。二是統一相同希臘文詞語的中文翻譯用詞。當然這樣的翻譯原則容易達成「信」的標準，也給查閱聖經重

單行本發行結束，準備出版聖經完整版而進行大規模修訂時，則改為「信、達、雅」三方面都要顧及。參：劉賽眉、王敬弘合著，《聖經十講》（香港：思高聖經學會，2004 修訂版），78~79 頁。

⁷⁰ 參：陳培佳、霍桂泉，〈修訂思高聖經譯文的經歷分享〉，《神思》89 期（2011），51~52 頁。

要概念在某本書所使用次數帶來了方便。但是我們知道，任何一種語言都有其語境，同一個單詞在不同的語境中會有不同的意義。

例如，修訂工作以《費肋孟書》開始，在修訂一章 6 節⁷¹時，把原來的譯文「因信德而懷有的慷慨」（ή κοινωνία τῆς πίστεως）嘗試修改為「同一的信德」，理由是 κοινωνία 有「參與」、「分享」之意，思高第一版譯作「慷慨」偏離了原意，而將 ή κοινωνία τῆς πίστεως 譯為「同一的信德」是為表達 κοινωνία 所包含的「共融、契合」之意。⁷² 我們尚且不論這樣的修改是否更符合原文之意，但就 κοινωνία 固然在《費肋孟書》只出現一次，然而在新約中卻共出現 19 次，例如斐二 1⁷³ 中的「聖神的交往」（κοινωνία πνεύματος）該如何修訂呢？所以統一希臘文詞語的中文翻譯用詞的原則值得商榷。

另外，此次的修訂工作也是為「利於教會聖道禮儀時做出更有效的誦讀」⁷⁴。這樣的目的和目標固然高尚，聖經和禮儀的關係也的確如膠似漆，無法分離，但是以同一本聖經譯本來達到不同目的（學術性、通俗性、禮儀性），以當前的人力，可行

⁷¹「我祈求天主，為使你因信德而懷有的慷慨發生功效，使你認清我們所能行的一切善事，都是為基督而行的。」

⁷² 參：陳培佳、霍桂泉，〈修訂思高聖經譯文的經歷分享〉，53 頁。

⁷³「所以，如果你們在基督內獲得了鼓勵，愛的勸勉，聖神的交往，哀憐和同情。」

⁷⁴ 參：陳培佳、霍桂泉，〈修訂思高聖經譯文的經歷分享〉，60 頁。

性有多大，需要三思。⁷⁵ 2011年時，《費肋孟書》和《弟鐸書》的修訂工作已經結束。但思高聖經學會目前的官網並沒有顯示「思高聖經」的修訂工作及其進度，所以也無法知道其修訂工作何時可以結束。

（二）對聖經中譯新譯本或已有版本修訂工作的幾點建議

經過了前面冗長的介紹，我們看到聖經原文及文本的多元，以及傳承過程中所展現的活力，一方面給譯經帶來了挑戰，同時也讓我們感受到聖經經文本身的生命力。沒有哪一個語言或哪一個時代，可以止住經文的繼續傳承，而且是以不斷更新的方式，繼續刷新我們的認知，擴寬我們的視野，邀請我們以謙卑的態度，透過所有人類語言的限度，去觸摸那無可言喻的生命之「言」。為此，筆者對聖經中譯新譯本或已有版本修訂工作，有以下幾點建議：

1. 我們不能不意識到時下原文聖經的出版的重要性，因為原文聖經之所以直到現在還在修訂出版，恰是為聖經的翻譯提供更為可靠的底本。
2. 翻譯時，應選擇至今聖經學界最被認可的原文做底本，但同時不能不參考其他語言的重要版本，尤其是古代譯本（七十賢士譯本、拉丁通行本），當然也包括現代譯本（法文版、德文版、英文版、意大利文版，等等）。

⁷⁵ 舉例來說，法文的天主教《官方禮儀聖經譯本》（*La Bible, Traduction Officielle Liturgique*），是由 70 位譯者參與，費時 17 年，才得以於 2013 年付梓。

3. 翻譯時，如遇到異文，最好不要直接放在譯本中，而是以注釋的方式呈現。聖經翻譯的工作離不開文本考證的工作，所以譯者應多關注今日聖經學界在這個領域的新的探索。
4. 爲不同的需要出版不同的譯本。比如爲了學術上的研究，需要更爲字面直譯的版本；爲了禮儀上的需要，可以考慮更爲意譯和口語化的譯本；爲了青年人或兒童，可使用更爲通俗易懂的語言。⁷⁶
5. 建立強大的合作團隊。方濟會的「思高聖經」雖然已經是集體完成，但參與的人數遠遠不足（不到 10 位）；道明會負責的《耶路撒冷聖經》（1956）完成於思高聖經之前（1968），但已經是至少 33 位譯者的合作成果，而且這些譯者來自不同的修會或教區，各自負責自己熟知的書目。

（三）對「共同譯本」的展望

在介紹了法文的 TOB 之後，我們不能不對類似的中文譯本充滿渴望。實際上，當法文版的大公譯本 TOB 在西方進行的如火如荼時，在東方，「共同譯本」的計畫也在醞釀之中。而提到「共同譯本」，我們不能不由衷感激房志榮神父。因爲他不僅積極參與這個計畫，而且爲讓這個計畫實現而舉行的會議，

⁷⁶ 房神父曾提出「意義（或動態）對等」的譯法，我認爲更適合禮儀上的譯本之所需。這樣，參與禮儀的人在聆聽時比較容易進入聖經語言所表達的意義。

他也留下了寶貴的記錄。⁷⁷ 房神父在 2015 年「台灣近代基督教學術研討會」上演講時，更是深情回顧與周聯華牧師共同翻譯聖經 30 年的美好經歷。⁷⁸ 原來遠在 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神學院剛從菲律賓碧瑤搬到今日天主教輔仁大學隔壁不久，他就想到：「若『思高本聖經』與『和合本聖經』能代表天主教與基督教的聖經，那麼為什麼不能有『共同譯本』聖經的出版呢？」然而，這個龐大的計畫並沒有像西方其他語言的大公版本那樣順利，目前我們看到的果實是 2015 年由「台灣聖經公會」出版的《四福音書—共同譯本》。

無法否認，聖經是所有基督徒共有的寶藏。雖然目前在華人世界，各宗派基督徒一起從事譯經釋經工作還存在一些挑戰，但是「共同譯本」依然應是我們共同的企盼。而且，在未來的「共同譯本」中，不僅有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書目，我們更希望也能像 TOB 那樣，加入東正教聖經版本所多出的書目。因為如果聖經學者已經意識到，為了解聖經正典著作的寫成背景，需要關注舊約和新約聖經同時代的經外著作，那這些東正教聖經所獨有的書目（而且是來自《七十賢士譯本》）更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參考。

（四）數碼版本中文聖經

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建立了數碼聖經庫（The

⁷⁷ 房志榮神父有關「聖經合譯委員會」的四次會議記錄，分別登載在《神學論集》75 期（1988 春）和 78 期（1988 冬）。

⁷⁸ 參：<https://krtnews.tw/chinese-church/local/article/default/10805.html>

Digital Bible Library) ，是爲了收集、確認和保護聖經文本和出版物等寶貴資料而開發的平台 (<https://thedigitalbiblelibrary.org>) ，其願景是於 2033 年容納世界上所有語言版本的數碼聖經。同時聯合聖經公會於 2014 年展開了一個龐大的中華聖經譯本數碼化工程，那就是把自 1661 年（今日倖存的中華地區的最早譯本是 1661 年的台灣平埔語譯本）至 1960 年爲止的聖經譯本數碼化，供公眾使用。⁷⁹ 這不僅方便查閱聖經，也爲正在進行和將要進行的聖經中譯工程提供無可比擬的參考資料。我們前面介紹了耶路撒冷聖經及考古學院的 BEST 出版計畫，那中文世界是否可以期待某種類似的聖經版本模式呢？

⁷⁹ 參：黃錫木博士，〈中華聖經譯本（1661~1960）數位化工程〉（2019.08.11）：<https://www.fhl.net/nbg/reading/reading542630.html>。